



张秋 著

正义的人质

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张秋 著

正义的人质

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义的人质 / 张秋著. —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 01

ISBN 978-7-5354-9293-7

I. ①正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战争片 - 电影评论 - 世界 IV. ①J90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5357 号

正义的人质

张秋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孟通

责任编辑 | 孟通 刘艳艳 封面设计 | 张志全

媒体运营 | 洪振宇

特约编辑 | 金浩 内文制作 | 齐娜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| 23

版次 |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470 千字

定价 | 42.00 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, 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www.cjxinshiji.com
出品

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·贝托鲁齐曾经说过，个人是历史的人质（哲学家萨特也有类似表述）。他正是从这个角度去拍摄《末代皇帝》的。在片中，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说：“皇帝从他登基那天起，就成为了自己领地里的囚徒，在退位后仍是。但现在他长大了，他会问为什么他是所有中国人中唯一一个不能踏出自家大门的人。我想皇帝是这个地球上最孤独的男孩。”连皇帝都成了囚徒，草民就更不待言了，且两者的境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。它只是用来说明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人质，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被历史绑架，乃至撕票的命运。而这种命运，在动荡的历史情境之中，在占大多数的普通个体之中，显得尤为惨烈。贝托鲁齐把皇帝还原为一个人，而且是外国人眼中的一个人，所以这个“孤独的男孩”打动了全世界观众的心。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，一个皇帝的孤独，所谓“高处不胜寒”，离百姓太远。更值得感知和操心的，是被压在历史底部的普通人——有多少统治者能体恤他们的疾苦？反观张艺谋在《英雄》中用秦王统一天下的“崇高理想”去感化向他寻仇的刺客，将暴虐之君尊为天下最大的英雄，这种硬往皇帝脸上贴的英雄史观，确实显得很可怕。刘小枫说得好，历史不是用来显现王权和天理的，而是为了个体生命力的伸展。生命力的权利与历史一旦结合，历史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理性法则，依据这个法则，历史也就有了意义。

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概念，都源于个人的困境（以赛亚·伯林语），而人质这个词，最形象不过地道破了个体身居历史之中的无力感，揭示了极具普遍意义的人之“存在与虚无”。对于这个词触电式的敏感，成为本书的写作诱因，我也因之将这三本书命名为“人质三部曲”。这个词串起了我特别喜欢、同时也在很大范围内引发观众共鸣的一个电影类型，即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“私人叙事”、而非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“宏大叙事”来记述历史，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管窥和洞悉历史的真相、人性的真相。在人质现象的背后，有着什么样的权力结构、社会机制和人性基础在发挥作用？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有意义的话（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），那么本书所认同的意义，就是历史必须服务并服从于个体生命力，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异己力量在发挥作用。

与官方的历史相对应，本书所选的这一类电影，连同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，为我们共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。这种记忆，浑身上下沾满了个体的血泪，浸透了个体的苦难。刘小枫将苦难记忆视为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，一种历史意识。他说，作为历史意识，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，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。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，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，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，

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。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、有罪的。

人质的角度决定了本书的两个要点：一、它的主体和站位是人，个体的人；二、这个人，不是英雄（或者说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），也不是伟人。福柯在《电影手册》的一次访谈中，曾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即如果不通过史诗这种手段，也就是说把历史当作英雄故事一样来讲述，历史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话语，找回自己的过去？福柯的质疑，正是我在选择影片时依循的一条重要思路。

三部曲涉及的历史背景当然不可能是全景式的，而是从电影这一素材出发，选择了具有标志性的现当代历史事件，或者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。第一卷《历史的人质》中是一战、二战，纳粹大屠杀在修订版中单列成章；第二卷《太阳的人质》中是前苏联、东欧，以及作为冷战时期标志的柏林墙；第三卷《正义的人质》中是两场“冷战中的热战”——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，“9·11”事件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也被纳入其中，藉此展望 21 世纪的未来岁月。热战与冷战相互交替的“极端的年代”、动荡的历史，已经并将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无数电影经典力作，它们本身也屡屡构成了历史性的事件，构成了国家与民族，乃至人类集体记忆史的一部分，推动着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，帮助我们对抗“有组织的遗忘”。本书选片力求经典，但同时也会兼顾电影中呈现的事件与人物命运的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马克·费罗作为首位获准参阅苏联档案的西方史学家，也是首位把电影当作历史代言人和史料来研究的学者，曾经如此阐述电影的功效——他说，借助记忆或口头证明的影像调查，如今比比皆是。这么一来，电影就帮助人们构建了一部非官方的“反历史”。电影在对照官方历史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，在唤醒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费罗认为，新闻片也好，故事片也好，影像所反映的现实看起来真实得可怕。人们发现，它未必符合执政者的论断、理论家的设想或反对派的分析。它非但未为他们的言论提供佐证，反而不时反衬出他们的可笑。电影具有这种功效，即解构了经过几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才成功建立起来的绝妙平衡。费罗并不认为各种类型的电影之间存在多少界限，在史学家眼里，虚构的影片是和历史本身一样的历史。他还说，无论哪一类影片——探讨法西斯主义的、纳粹主义的，还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，最成功的始终是那些把个体的经历如一对夫妇、一个家庭等的故事搬上银幕的。本书所选影片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

笔者意在探讨个体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，进行选择的空间和能力到底有多大，以及孤

独无援的个体在做出选择时，所经历的种种身不由己的矛盾和痛楚，藉此思考这样一些问题：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，缘何又被历史所绑架，所囚困，所遮蔽，所压制，所蹂躏，所牺牲，个体的人如何被成功地分子化、碎片化，如何“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”，如何不约而同地走向“通往奴役之路”，如何沦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数字，当然，还有如何“尽人性的本分”，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。本书也藉此证明，自由不是天赐，它的获得需要信念的支撑，并且常常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而个体与历史之间对比悬殊的肉搏，将永无休止。人质这个词代表着不自由，代表着历史的悲观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，意味着个体的无为。正如波普尔所说，他主张历史没有意义，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历史所做的一切在政治权力史中显得束手无策，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。尽管历史没有意义，但我们能够给予它意义。

三部曲上百万字的写作，花了我七年多的时间，其中甘苦，唯有自知。笔者并非从事历史研究，只是从多年浸淫其中的电影出发，作些兴之所至的阅读。本书有点类似于看片笔记和读书笔记的结合体，其显而易见的缺陷是引述过多、文字过长，望读者见谅。刚开始酝酿这个选题时，我用的是笨人笨办法，先把网撒开再说。我同时面对两个大海：一是历史之海，二是电影之海，网罗的原始素材多到难以招架。之后便开始根据“人质”的主题、每卷内容的相对完整和独立、各卷之间分量的平衡，以及相关片源的支撑等等要素，反复整理、压缩、筛选，直至确定为三卷本。必须承认，这仍然是个很大的架构，写这样一套书，对我而言是不自量力，但我无法抵挡这一诱惑。《历史的人质》其实是一开始起的总书名，后来才给二、三卷起了分卷名。

感谢金浩、孟通对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。感谢陈蓓对我一如既往的包容。

张秋

2016年岁末

“必要之恶”及正义的成本（自序）

书稿付梓前，李安的新片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正在热映。比利便是一个标准的“正义的人质”。作者本·方登在小说中如此描写比利和B班幸存士兵的命运：“……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。当然。受人摆布是他们最基本的要素，士兵的任务不就是给上级当卒子吗？穿上这个，照那样说，到那里去，朝他们开枪，最后，当然了，他们的终极任务就是送死。B班的每个人都是威逼利诱这门艺术的博士。”这便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人质化处境。这部作品的犀利之处，是它形塑了与前线反恐战场相对应的另一个战场——这个战场位于和平的祖国大后方，这个战场上的疯狂与残忍，是以英雄崇拜的名义出现的。所以，李安在取片名时将原著的“中场休息”改成了“中场战事”。对比利来说，这场只有礼花，没有硝烟的战事，比前方的战事更荒谬，也更难熬，因此最后，他和他的那班弟兄们，宁愿回到真正的战场，也不愿充当被人到处牵着走的演员，充当“站桩”的道具。影片提供给观众浸入式体验的对象，是裹挟、控制比利的一种情境性力量——如原著中所述，“他的美国同胞身上有一种残忍的东西、一股狂热、一种欣喜若狂、一种强烈的需求”。作品并未停留在反战的层面，它的矛头直指这场战事的“观众和啦啦队”，指向把比利等人送上战场的所有人。原著中最核心、最尖刻、最致命的是这一段：“这些面带微笑的一无所知的市民，他们才是对的。过去两个星期，因为在战争中学到的东西，比利自以为高人一等，比别人聪明。啊，他错了，这些愚蠢无知的傻瓜才是掌管一切的人，他们的祖国梦才是左右大局的力量。他的现实不过是给他们的现实做牛做马，他们的不知道比他的知道更加强大。”

本卷中影片所涉的历史线索，是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：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，其中前两场是冷战中的热战。三场战争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联系，它们给美国，给不同的阵营，给世界文明、全球政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。身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，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比两次世界大战更为谲诡、艰难的命运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但陷入了战争的迷雾，还陷入了正义的迷雾。也就是说，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——无论是开战正义还是作战正义，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，而是极富争议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何为？人性何为？

《现代启示录》中幽灵般的法国殖民者问道：“你们美国佬为什么不从我们身上吸取教训？”；《早安越南》中罗宾·威廉姆斯扮演的军方电台主持人，在被解职后的告别留言中说：“还记得那些带你们去朝鲜的人吗？没错，是美国军方。即便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国家所做的是正确的，或许也不该由军队来做”；身为越战老兵的奥利弗·斯通，在2006年夏

纳电影节为他的《野战排》举行特别放映时，却不禁感到“令人羞愧”，因为“只过了10年、15年，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又开始发生了变化”；德·帕尔玛在威尼斯电影节谈到为何要拍摄伊拉克战争题材影片《节选修订》时说，他感觉当年拍摄的《越战创伤》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反省与关注……

其实岂止是美国。基辛格在其早年的博士论文《重建的世界》的结尾，就曾不无悲观地写道：“可以肯定的是，国家往往是健忘的。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，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，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如同个人经验一样，具有偶然性，只教训某些行为的后果，但不能强迫人们意识到类似的情况”。他由此指出了历史的挑战和悲剧之所在，那就是“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，只能尝试一种解释、一次实验，因为他们是自己这一代人的实验对象”。这便是一种人质化的处境。

针对一段历史，人们或者讳莫如深，或者在真相公开之后纷纷声称要吸取教训，但出于立场、视角、智慧或者策略等等方面的原因，他们总结的教训往往并不触及痛处和要害——从政治家到历史学家，从当事者到局外人，概莫能外。基辛格所总结的越战教训，也未能摆脱自身的局限。更有甚者，对于同一段历史，不同的人从中提炼出的教训可能完全相反。历史由此向我们进一步展现了它“黑暗的心”，那就是“进步”观念的摇摇欲坠。

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7年的《国情咨文》中，引用托马斯·杰弗逊的话来形容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局，这句话是：“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，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，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。”美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是，如何防止从“不得不”，滑向主观故意，使“善之恶”或曰“必要之恶”的雪球越滚越大，从而将这一可悲的人类社会法则，变为值得夸耀的美国法则。越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86岁时同意接受了一次访谈，他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11个教训，其中第9条的内容是：“为了行善，你可能不得不作恶”，与杰弗逊所总结的法则如出一辙。本书三大战争题材的电影中便充斥着这样的法则，让好几代“实验对象”陷入了极大的分裂和迷狂。尽管“恶”的性质不同，但我们不得不说，极权之恶，或者说“恶之恶”，也采用了相同的逻辑和修辞，而且它对于“善”的愿景描述更为诱人——这正是正义所面临的险恶处境。也就是说，“善”既可能成为“恶”的正当理由，也可能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。“恶”因此成为“必要的代价”，被打入正义的成本——其中包括具体实施“必要之恶”以及造成“附带损害”的人力成本，而这些人，就是本书影片中的主人公。美国前总统卡特因此对美国“濒危的价值观”忧心忡忡：美国曾经是全球称赞的、

杰出的人权卫士，如今却已成为国际组织担忧的头号人权破坏者之一——“我们的一些行为与那些我们过去所谴责的暴虐政权如出一辙”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何为？人性何为？

这三场战争集中反映了美国自身所面临的矛盾。如基辛格所言：“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，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。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，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，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。”（《大外交》）基辛格对美国及其秩序观做了客观、精辟的总结：“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，然而历史上，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：它以‘天定命运’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，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；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，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；最终成为超级大国，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”；“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，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。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”；“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，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，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。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，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”。（《世界秩序》）

这样的矛盾和分裂，不可避免地在“实验对象”身上爆发。本卷的影片中充满了这样的困惑和诘问——当有人告诉你“必须摧毁那个国家，才能拯救它”时，你会不会用打火机点燃村民的草屋，并且“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”？当有人暗示你“得把犯人当狗一样看待”时，你会不会发明各种手段去虐囚，并且兴高采烈地将虐囚照上传到网络？当有人命令你“如果总统想要发动战争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能够让他这样做的情报”时，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，并且守口如瓶？当有人说服你“我们得把他们的生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”时，你会不会对无辜平民（包括妇孺）开枪扫射或发射导弹，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“这是值得的”？……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何为？人性何为？

与美国自身的矛盾性相对应，世界对于美国的评价同样面临着极大的矛盾，它浓缩于这样一个问题：“假如美国不存在，世界将会怎样？”（迪希内·德·索萨语）希拉里·克林顿在谈及“巧实力”战略时所说的话，可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：“美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紧迫问题，同样，离开了美国的力量，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。”提出“软实力”、“巧实力”概念的约瑟夫·奈认为，21世纪的权力正在发生两大转移——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，二是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，因此他指出，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，已经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，美国人不应该再问谁是全球老

大，也不应该总是考虑主导权，而应该开始了解，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权力手段构建巧实力战略，寻求与他国相关的而不仅仅是超越他国的权力。他在2015年的新著《美国世纪结束了吗》中写道：如果“美国世纪”始于1941年，那么到2041年时，美国是否仍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，并在全球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？他的猜测是：“是”。

笔者无意在“亲美”和“反美”两派中站队。即便要说“反”，也是反思的反。正如《谁在反对美国》一书的作者所言，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一样，都具有异质性和多维性。谁在反，反什么，为什么反，在什么时候反，如此这般的问题，都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判断，任何将其简单化、情绪化的企图，都徒劳无益。

张秋

2016年12月

1950

朝鲜战争（1950.6.25—1953.7.27）

“既然一切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性都在我们这边，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”

——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东北亚处处长艾利森，在参与讨论政策设计司于1950年7月22日草拟的“关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美国政策问题”报告时如是说。

“只有一场惨败才会改变我们目前的制度，这一制度正把我们引向灾难。”

——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团团长刘易斯·普勒上校1950年11月在营地私下给妻子写信说。他对麦克阿瑟在寒冷的冬季发动一场“结束战争的攻势”疑虑重重。

目录

- 1 “人质三部曲”总序
- 4 “必要之恶”及正义的成本（自序）

第一章 坚韧的刺刀

朝鲜战争（1950.6.25—1953.7.27）

- 2 “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”——《钢盔》
- 19 “大家都是懦夫，又都是勇士”——《坚韧的刺刀》
- 34 要恋爱，不要战争——《樱花恋》
- 46 在“无意义”中寻找意义——《猪排山》
- 60 和“另一个我”同归于尽——《满洲候选人》
- 75 只有野战医院才显示出什么是战争——《陆军野战医院》
- 89 “意识形态就那么重要吗？”——《太极旗飘扬》

第二章：现代启示录

越南战争（1961.5.14—1975.4.30）

- 108 一场自杀性赌博游戏的牺牲品——《猎鹿人》
- 123 “他本身就是一种无法穿透的黑暗”——《现代启示录》
- 150 “我们是在与自己作战”——《野战排》
- 167 不堪一击的“全金属外壳”——《全金属外壳》
- 186 电台播音室里的特殊战争——《早安越南》
- 201 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？——《越战创伤》
- 217 “没有上帝，没有国家，只有我和轮椅”——《生于七月四日》

第三章：“必要的杀戮”

反恐战争（2001.10.7—2014.10.26）

- 236 宁可错抓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——《关塔纳摩之路》
- 251 “节选修订”，直接指向现实本身——《节选修订》
- 271 英雄主义成了一种病——《拆弹部队》
- 285 “权力的逻辑”超越了事物本身的逻辑——《公平游戏》
- 301 反恐“制造”了新的“恐怖分子”？——《必要的杀戮》
- 312 “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”——《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》
- 334 “自我关涉”才是真正的“善意”——《善意的杀戮》
-
- 352 延伸观看片目索引
- 353 参考书目

坚韧的 刺刀

1

第一章

“老兵不死，
只是凋零”

——《钢盔》



人质：扎克 | 身份：美军中士 | 结局：幸存

《钢盔》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，其价值和地位，不仅仅表现在它对这场“冷战中的热战”所作出的第一时间的快速反应——影片诞生于战争爆发半年之后，从剧本创作到摄制完成仅用了短短三周时间，其中拍摄周期只有10天——更在于它所抱持的鲜明反战态度，以及对这场战争性质的深刻洞见。这也是美国“B级片之父”塞缪尔·富勒拍摄的第一部战争片，他集编剧、导演和制片于一身，片中故事来源于韩国退伍军人，也结合了富勒自己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。富勒在1951年又一鼓作气推出了第二部朝鲜战争片《坚韧的刺刀》。电影与战争同步，使其具有了**战时媒体**的性质。富勒试图通过自己的电影告诉观众，真正的战争决不像新闻报道中那么简单，而是充满了非人道的残酷与混乱，他不想为虚假、崇高的英雄主义唱赞歌，而是想表现普通士兵的困顿与艰难，表现他们的种种“不完美”。《钢盔》上映后被指有“亲共”和“反美”倾向，甚至被怀疑由共产党秘密出资，富勒因此受到FBI（美国联邦调查局）的调查。此外因片中出现美军枪杀俘虏的情节，富勒还得罪了五角大楼。

富勒始终以好莱坞的局外人自居。除了B级片（通常指成本低廉的小制作），他对美国的黑色电影、独立电影以及战争电影均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马丁·斯科塞斯称其为“自电影诞生以来最勇敢，并且拥有最深刻道德感的导演之一”，评价他的电影“拥有横扫一切陈词滥调的力量”，是他看过“最真实，最少感伤和最为硬派的”。富勒选择的题材往往争议性极强，他塑造的主人公则多处于社会边缘，有很多是罪犯（小偷、杀人犯等），他的战争电影也是采取反英雄的姿态，而这些都与他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。

富勒12岁起就在报社打工，给记者当送稿员，17岁时受聘于《纽约日报》（New York Journal），成为最年轻的报道犯罪新闻的专职记者，他还兼任《圣地亚哥太阳报》的记者，常常被派去调查凶杀案、贪污案或者罢工事件的真相。富勒24岁开始创作小说并为B级片撰写剧本。“小报”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有人便将他的电影风格形容为“故事小报”（narrative tabloid）。他自己说过，他的本性总是喜欢告诉人们真相，哪怕人们觉得是受了侮辱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富勒参军入伍。一开始他被分配到新闻部，但他执意要成为一名参战步兵，由此加入了美国陆军第一步兵师（俗称“红一纵队”）。于是在《钢盔》中我们便听到了关于步兵的黑色幽默——一名日裔士兵抱怨说等打完这一仗就去当空军，再也不在地上摸爬滚打了，男主人公扎克却反驳道：“在飞机上被打中怎么办？你还是要掉到地上，等于死两次。在船上被打中，会往下沉，在坦克里则会被烧焦。还是步兵最简单，要么死，要么活，总之都在地上。当步兵才是最好的。”

富勒经历了二战中的北非登陆、西西里岛登陆和诺曼底登陆等一系列重大战役，获